

著名作家 在北大的演讲

陈晓明 艾克拜尔·米吉提 主编

王充闾

李锐

刘震云

苏童

王蒙

莫言

赵瑜

蒋子龙

阎连科

从维熙

张伟

格非

严歌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名作家 在北大的演讲

陈晓明

艾克拜尔·米吉提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名作家在北大的演讲/陈晓明,艾克拜尔·米吉提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301-20925-7

I. ①著… II. ①陈… ②艾… III. ①演讲-中国-当代-选集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7392号

书 名: 著名作家在北大的演讲

著作责任者: 陈晓明 艾克拜尔·米吉提 主编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925-7/I·24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0印张 250千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写在前面的话

陈晓明

最早动念头想做“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始自 2008 年秋天，那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束的时间。有一次与阎晶明、胡殷红等多位朋友聊天，说起我想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以及其他知名中国作家请进北京大学，与青年学生面对面交流，我的想法得到几位朋友的首肯。后来又征询李敬泽、吴义勤、施战军、孟繁华几位朋友的意见，也得到赞同，这就促使我去实施这件事情。

我以为，北大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平台，学生思想活跃，对文学还保持着热情。作家走进校园，可以了解现在大学里的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和想法、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和看法，青年学生也可以了解当今中国最好的一批作家的思想和文学追求，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这对于文学应该是一项积极的有意义的活动。后来因为筹集资金多方未果，只好放下。2008 年底，在系里的 211 计划申报时，我也做了方案，在系里举行的一次关于“发展战略”之类的小型会议上我还说了出去。有一段时间自己没有落实，心中颇为不安。2009 年 3 月，在中文系做访问学者的江力先生联系上了王充闾先生，请他来北大中文系演讲。那次演讲很成功。这是一个好的开头，这项活动就可以进行下去了。当时还是没有什么经费，由系

里先垫付。好在陈平原主任和蒋朗朗副主任、陈跃红副主任都非常支持此项活动,我也相信我们可以筹集到资金,随后四处寻求合作伙伴。接下去就找到盛大文学网文学研究所黎宛冰所长,我与宛冰熟识,一说起此事,她就立即着手促成。盛大文学网有非常强劲的文学宣传平台,由他们来提供资金和宣传支持,非常理想。此项计划很快得到侯小强总监的支持,我们当即就达成了协议。盛大文学网支持了我们三期活动,后来续签协议拖了一段时间。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在参加由《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先生主持的一个评奖活动时,与他说起我们的“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艾克拜尔先生几乎没有犹豫就立即拍板支持我们。他说,“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由《中国作家》来支持,名至实归,也责无旁贷。此说我深表赞同。与《中国作家》杂志的合作迅速展开,令人愉快。艾克拜尔先生是我见过的人中办事最为果断利落的,他是有气魄有能力干大事的人,如此活动,自然不在话下。每次活动,艾克拜尔主编都高度支持,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他每次都到场,陪同作家一起吃饭,到作家演讲会上做嘉宾,实在可贵。对于每次演讲,艾克拜尔主编都安排《中国作家》在显要位置予以报道,发表作家演讲稿,刊登活动照片。《名作欣赏》的续小强主编也给予了全力支持,率先发表作家演讲稿。《中国作家》和《名作欣赏》推广此项活动,让这个活动在中国文坛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这个活动,在中文系,也得到了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和蒋朗朗副主任的鼎力支持。平原主任只要北大,都积极到场,或发表致辞,或做嘉宾。蒋朗朗副主任对活动的支持令人感动,几乎每次他都做嘉宾。不管多忙,他都挤时间参加,而且陪着一起用餐。有一次格非来演讲,他在丰台那边参加一个学习班,路上堵车近两个小时,他也赶过来陪同用餐,以示对活动的重视,对作家的尊重。另外,校领导也很重视。有一次张炜先生来演讲,我们试着请周其凤校长来参加,没想到周校长一口答应,过

来陪同张炜共进晚餐,餐后一起到会场听张炜演讲,一听就是三个小时。也许是那天张炜的演讲太精彩,周校长听得很入神,演讲后还做了即席的演说,鼓励同学们热爱人文文化,自觉承担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的重任。

活动到2011年秋天已经举办了十多次,邀请的作家先后有王充闾、李锐、刘震云、王蒙、莫言、从维熙、蒋子龙、苏童、张炜、阎连科、格非、严歌苓等。

在这里要感谢所有到北大演讲的著名作家们,他们的演讲在北京大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给北京大学带来了高品质的精神食粮。感谢艾克拜尔先生对活动的鼎力支持;感谢盛大文学网的侯小强先生、黎宛冰女士的支持;感谢众多的新闻媒体的支持;感谢我的博士生丛治辰、陈新榜等人,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后期整理工作;感谢《中国作家》杂志社萧立军副主编及多位编辑朋友;感谢中文系诸多同仁和我的学生们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因为人数众多,在此就不一一提及。

现在,此项活动又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张雅秋编辑不辞劳苦,收集相关资料,现在编辑成书,给这项活动留下一份纪念,以飨读者。

2012年7月2日

目 录

陈晓明

写在前面的话 / 1

王充闾

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 / 1

李 锐

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 21

刘震云

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 / 49

苏 童

重返先锋

——文学与记忆 / 79

王 蒙

话题与歧义

——关于现当代文学 / 103

缅怀冯至：《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剧本朗诵会 / 124

莫 言

我的文学经验

——历史与语言 / 133

赵 瑜

对现实说话

——非虚构文学的创作 / 158

蒋子龙

文学回应时代

——改革英雄今犹在 / 180

阎连科

小说与因果

——文学中的“小历史”思考 / 194

从维熙

文学与人生

——创作的个体经验 / 207

张 炜

留心作家的行迹 / 223

格 非

故事的祛魅和复魅

——传统故事、虚构小说与信息叙事 / 252

严歌苓

文学和影视的较劲 / 284

“中国作家北大行”之一

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

王充闾

时 间：2009 年 3 月 19 日上午

地 点：北京大学中文系二楼报告厅

致 辞：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嘉 宾：林 非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温儒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蒋朗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是想说说我在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中，如何以一种开放的、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现实关怀的含义很广泛，我在这里指涉的是关于现代性的判

断与选择,体现在对于现实人生与人性的关注,诸如人生的困境、生存的焦虑、命运的思考、人性的拷问等各类问题。

几十年来,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一直是情有独钟的,这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我的祖籍是河北大名府(曾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当时称做北京),千百年来,这里传承下来说书讲古的传统。陆游诗中描写的故乡山阴的情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前在大名也可以看到。祖辈上,据说是由于河水泛滥,村屯成为泽国,一支王姓家族迁徙到山海关外的医巫闾山脚下,顺便也就把这种说书讲古的风习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手里挥着大蒲扇,“脏唐臭汉”、“南朝北国”,讲起来就没完。我们那里自然环境也很特殊,紧靠着大苇塘,秋风起处,蒹葭苍苍,芦花飞雪。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土匪可以任意出没,成帮成伙,所谓“三人行,必有一匪焉”。当地人称他们为“胡三太爷”;日本鬼子不敢靠前,提起他们来要说:“红胡子,大大地可怕呀!”结果就成了一片化外荒原。官办学堂也有,但要走出十几里路,太远了,我的叔父就创办了一所家塾。他在老东北军里谋过差事,既满腹经纶,又颇有积蓄,朋友中正好有一位老学究,他便请过来给自己的儿子和我开设了专馆。我们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入手,接下来读“四书五经”,尔后是左史庄骚、《昭明文选》、袁王《纲鉴》、《古唐诗合解》,等等。整整读了八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史根基,直到共和国成立,我才进了中学、大学。

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从前传下来这样两句话:一是“文史不分家”,二是“六经皆史”(此论首倡于元代的郝经,后经清代的章学诚系统地提出,意思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种经书都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政教的历史。龚自珍、章太炎都认同此说)。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历史,进了中学以后,正史之外,还读了一些演义类小说和咏史诗以及中

外的历史剧。司马迁的《史记》在私塾里早就读过,始终爱赏不置;我还喜欢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鲁迅的《故事新编》。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照黄裳的话说,“是学者散文的典范作品”。而到了黄裳笔下,就成批地出现了,《花步集》、《锦帆集》、《金陵杂记》,不下六七本,1960年代还有翦伯赞的《内蒙访古》,都可以说是今天所谓的历史文化散文。看来,这种文体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由某某人始创,只不过当时没这么命名。其实,现在这种叫法也并不十分确切。

喜欢历史文学,似乎也并非我个人的偏好。当前,尽管有些历史散文作品不能尽如人意,有的借助史料的堆砌来救治作家心灵与精神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长,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做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的展示,但读者群仍然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一些历史小说,那么饱遭非议,观众、读者还是非常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对此,我作了一些思考,也曾向文友们求教。这次到台湾访问,我同当地一些作家、出版商(因为我在尔雅出版社和知本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过散文集,结识了他们的老板),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他们都讲,大陆在台湾出版的书籍中,历史小说、散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综合多方面的认识,读者之所以欢迎,大致有四方面原因:

一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康熙帝、曾国藩),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经久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

二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

定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朱光潜先生也说,“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

三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更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

四是就作者而言,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因为这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黑格尔语)。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还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一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使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的当前的目的的事情。偶尔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

至于中国大陆 1990 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这可能和社会、时代有着密切关联。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而文化散文较之轻灵、精致的抒情、写景的美文,有着更多的文化反省的意味,写得好可以提供较深的精神蕴涵。

二

我从1995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15年来,结集为9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开始写作时,同样存在前面说过的缺陷——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后来逐渐地加以改进,努力做到有真性情,有现实感。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实际上,他所讲的也就是现实关怀,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将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疑难、困惑表现出来,用过去鉴戒当下,寻找精神出路,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出发点。在创作实践上,我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点,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抒怀寄慨,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宣泄出一己的感喟与见解。太史公作《史记》,应该说是十分客观的,但里面同样也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成分。《古文观止》的编者即指出,观《报任安书》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敢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三句,“则知史迁作《货殖》、《游侠》二传,非无为也”。此前,金圣叹也曾说过:“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

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史记》作为信史,以客观叙事为依归,尚且如此;而个性更为鲜明的文学作品,自然更应该充分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思想倾向。

我写过一个友情系列。这里有宋美龄与张学良信守承诺、始终不渝的感人佳话;有周恩来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的动人美谈。同样都是清代的政要,我写了纳兰性德为了营救患难中的吴兆骞,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李光地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竟然恩将仇报,出卖朋友陈梦雷。在《不能忘记老朋友》一文中,我写了周恩来总理由于长年累月超负荷地工作,特别是“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使他的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结果患上了恶性肿瘤,并已严重扩散,原本一米七三的头,最后只剩下了30公斤半的体重。住院20个月,经过大小手术13次,输血89次,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管子,以致连翻身都受到限制。可是,他在临终前却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特别提到了张学良,说他是千古功臣。周总理的朋友很多,有大量党外朋友。他秉承着传统的“我有恩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于我不可或忘也”的古训,哪怕是别人的一点点好处,所谓“滴水之恩”,他都永不忘怀。长征途中,他患病高烧,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参与用担架把他抬出草地。多少年过去,他一直记怀着这件事。1954年杨立三因病去世,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顾工作繁忙,亲自参加追悼会主祭,最后还坚持要抬棺送葬,体现了一种平等而深挚的同志之情。我在文章中写道:“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

经验。”

这篇散文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许多知名人士,有的是老专家、老干部,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说是“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原因在于它触碰到人们的“情意结”。我们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有时确是翻脸不认人,把老朋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一脚踢开。像张伯驹所慨叹的:“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说到张伯驹,令人感慨万端。出于爱国至诚,他将一生中倾家荡产买下的视同生命、价值连城的书画等国宝,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可是,却因坚持上演封禁的《马思远》一剧竟被划成右派。至于在革命、建设时期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而在“反右”、“文革”中被错划为右派、打成反革命,甚至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的,更是所在多有。长期以来,每当想到我们国家处在创业维艰的草创阶段时,有那么多老朋友向风慕义、毁家纾难、赤诚相与、万里来归,我都为之无比振奋,向往于无穷,同时也为这类“忘掉老朋友”的作为感到痛心。

写张学良与宋美龄的重情守信,也是有感而发的。文中说:在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华夏,自古就流传下来“挂剑空垆”、“一诺千金”的诚信美谈。及至现代,世道浇漓,人情薄如纸,一切以功利、实用为转移。“红口白牙”当面承诺的事,甚至“剖符作誓,立字为据”,到头来都统统不算数,说翻就翻,说变就变。正因为如此,今天记下两位百岁老人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根于良知的信守不渝,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在一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倡导领导干部要主动地交朋友,尤其是党外的朋友。我说,实际上,大量的领导干部是没有朋友的,你看着身前身后围拢着很多人,那并不是你的真正朋友,许多人是趋炎附势,交相利用,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昔日的所谓“朋友”纷纷作鸟兽散,最后门可罗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人家自然就弃之如敝屣了,正所谓“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要真正结交朋友,必须待人以诚,推心

置腹，志同道合，声应气求。这样，你即使倒霉了，下台了，他们仍然与你相知相重。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第二点，这些历史文化散文，大多形成系列的组合。像爱情系列，我写了勃朗特三姊妹的“求不得”，陆游与唐婉、纳兰与卢氏的“爱别离”，乾隆与香妃的“厌憎会”，写了朱淑真的大胆泼辣、无所顾忌，于凤至的痴情苦恋，歌德的割情断念。还有人生困境、人性纠葛的系列，写了李清照的愁，曾国藩的苦，李鸿章的无奈，严子陵的逍遥，纳兰性德的难言之隐，瞿秋白的内心矛盾，张学良的复杂个性，李白、李煜、赵构自我定位所造成的困惑。还有友情系列、知识分子系列、帝王系列等等。有评论家说是体现了清醒的文体意识；有的概括为“工程意识”。实际上，写作当时并没有像完成一部学术专著那样，先有一个总体构想，然后写出各个篇章。这所谓系列是后来归纳出来的。这些文章的形成，都是在现实中对于人性弱点、人生困境、命运抉择中的种种困惑有了一种深刻的感悟，然后从烂熟于心的史海中找到种种对应人物来“借尸还魂”。

我在写作中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学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学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歌颂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用反讽、揶揄等解构手法，写了一部《龙墩上的悖论》，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吊诡、悖论，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艺术的消解。